



为传统史学续命： 宋慈抱《续史通》的民族本位思想

蹇伶尧

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宋慈抱撰《续史通》，于欧风强劲之时，以“续”为名，效仿、光大《史通》及其代表的传统史学理论，肆力于对传统学术体系与命脉的传承，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本位思想。《续史通》还自觉称引和继承浙籍学者的史学主张，形成了推尊浙籍学者和浙东史学的特色。宋慈抱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守护，在当时的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但放在历史的长时段看，亦是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学术力量。

关键词：宋慈抱；《续史通》；民族本位思想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710

收稿日期：2023-02-16

作者简介：蹇伶尧，女，四川营山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学史，E-mail: 1372267186@qq.com。

进入 20 世纪，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显然加快了。1902 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拉开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序幕。中国现代史学是以引进西方史学、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形式而产生的。与西方史学接轨，向西方学术看齐，甚至以西方史学为标准评判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初期的主潮。然而，在此主潮下，以民族史学话语继续延续传统史学理论体系者，亦不可忽视。生活于史学渊薮浙东地区的宋慈抱，就是这样一位学人。

宋慈抱(1895—1958)，字墨庵、默庵，浙江瑞安人，一生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温州、杭州，虽曾短暂就读于私立东瓯法政学校^①，但未系统接受新式教育，以自学和跟随王景羲^②等人游学为主。1934 年至 1935 年间，宋氏撰《续史通》，陆续刊登在《瓯风杂志》和《国学论衡》上。其内篇有《惜马》、《斥班》、《尊欧》、《恨李》、《国志》、《晋记》、《唐书》、《宋史》、《四通》、《两案》、《曲笔》、《浮词》、《表志》、《纪传》、《补述》、《方乘》、《载记》、《论赞》、《沿革》、《体例》，外篇有《考献》、《监修》、《模拟》、《创造》、《因时》、《度德》、《损益》、《毁誉》、《注释》、《评断》、《问刘》、《诘章》、《点烦》、《辨惑》、《政治》、《人物》、《疑信》，合计 37 篇^③，曾引起金毓黻、傅振伦等学者的关注。然而，长期以来，相较于学界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等主流学者的研究，宋慈抱几乎成为被历史遗忘的人物。近些年来，随着学术史研究的扩展和深入，更由于对民族优秀史学遗产的重视，宋慈抱的著述

^① 参见：宋慈抱《甲申年五旬述怀四十四首》，1945 年油印本，无页码，下同。按：私立东瓯法政学校由徐定超创建于 1912 年，学校位于浙江省永嘉县。详见：陈光熙主编《徐定超集》(下)，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47—450 页。

^② 王景羲(1860—1916)，字子祥，浙江永嘉人，曾在孙衣言的诒善祠堂教导弟子，后任温州府中学堂国文经学教席，为孙诒让重订《墨子问诂》，撰有《墨商》3 卷。

^③ 据宋慈抱《金著〈中国史学史〉商榷》(载《东南日报·文史》1947 年 4 月 30 日第 40 期，第 7 版)一文，宋氏家藏本《续史通》，大致目录未变，仅《沿革》改为《体制》，《体例》改为《义例》，另有《功罪》、《杂说》、《余论》3 篇，合共 40 篇。家藏本《续史通》或已不存。

和学术思想开始受到史学界的关注^①。本文以宋慈抱《续史通》为中心，探讨其延续传统史学的学术旨趣，并通过他对民国主流学界的省思和评论，揭示其民族本位史学思想的特质。

一 承继《史通》的理论体系

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是7世纪前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对其后的史学理论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史通》流传之后，赞誉与批评不断，不乏注释、考论之作。宋慈抱之前，虽也偶见学者有续作之意，但均未见其成。宋慈抱撰成《续史通》，这在《史通》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更为紧要的是，《续史通》问世之日，正值“国学湮微”^②、学术趋新、欧风强劲之时，宋慈抱以“续”为名，效仿、光大《史通》及其代表的传统史学理论，其意显豁，乃在延续传统史学命脉。因此，赓续传统便成为《续史通》的鲜明特色和学术旨趣。

宋慈抱早年在王景羲的指点下研读《史通》、《文史通义》等著作，甫一接触便“如婴孩得乳，乐而忘疲”^③。他赞叹刘知幾：“刘生述史，《申左》《惑经》。盖奇思阔议，足使鸡冠猴佩丧其容，龙门兰台变其色。”^④他期望能如刘知幾般觅得学术知音：“徐坚座右，铭《惑经》《申左》之奇谈，仆盖其人焉？”^⑤旋即仿照《史通》体例撰《诗学刍言》^⑥，批评古代诗歌，由此迈入学术研究新阶段。年轻的宋慈抱以刘知幾为学术榜样，广泛阅读经史书籍，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认识，如“尼山褒贬寓《春秋》，到定哀时曲笔修”^⑦。他赞扬司马光《资治通鉴》：“温公史笔媲《春秋》，周季先书晋列侯。褒贬是非终五代，纵横上下异三邹。引锥我读蜚英槩，削简谁成考异垂。”^⑧宋慈抱在史学评论方面的丰富积累，为他后来撰写《续史通》准备了条件。从外部环境来看，当时如火如荼的整理国故运动，也让《史通》重新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傅振伦曾指出，“迩来国人整理古籍之风蔚起，有以近代史学眼光批判《史通》，见于期刊者，往往而有”^⑨。在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下，民国时期的《史通》研究主要从训释、校注、批评等角度展开。所谓“近代眼光”，就是指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宋慈抱于此撰写《续史通》，意在维持《史通》“高义”于不坠之地，为《史通》研究开一新境。正像他说的，“我欲《史通》置座右，续伸高义日星垂”^⑩。

《续史通》在篇目、体系与思想观点等方面均明显继承了《史通》。《续史通》的篇名，有十篇直接沿用或稍作改动自《史通》，另有七篇与《史通》虽略有不同，但内容上仍有明显的效仿之意，详见表1。

表1 《续史通》与《史通》篇名关联比较

《续史通》直接沿用《史通》的篇名	《曲笔》、《浮词》、《论赞》、《模拟》、《点烦》、《人物》、《杂说》
《续史通》改动、合并《史通》的篇名	《表志》、《纪传》、《载记》
《续史通》模仿《史通》而设计的篇名	《考献》、《沿革》、《度德》、《监修》、《补述》、《损益》、《体例》

篇目上的因袭和效仿，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宋慈抱对《史通》史学理论体系的继承。《史通》包括史学发展史、史书表现形式、史料搜集与考辨、史书编撰方法、文字表述、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方面的理论以及史学社会功用等方面的内容^⑪。从这些篇目的内容看，《续史通》赓续《史通》之意亦非常自觉。

关于史学发展史，《续史通·考献》继《史通》之后续写了唐初至清初的官修实录、国史、正史等重要史书

①学界对宋慈抱的研究，集中于生平介绍，如易瑶瑶的《宋慈抱》（余振棠编《瑞安历史人物传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271页）和许世铮的《文史前辈宋墨庵》（政协瑞安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瑞安文史资料》第9辑，1992年印行，第36—38页）；至于其史学思想及著作的研究，仅零星见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234—236页）和凌简《刘咸忻的〈史学述林〉和宋慈抱的〈续史通〉》（《中国史学史资料》1961年第4期，第16—17页），尚有深入挖掘的空间。

②宋慈抱《邵兴侠哀词》，宋慈抱《墨庵二十以后古文》，同文印书馆铅印本，印行年份不详，第49页。

③宋慈抱《王子祥先生墓表》，《瓯风杂志》1934年第10期，第6页。

④宋慈抱《辨瑕论》，宋慈抱《墨庵骈文甲集》，1921年刻本，第12页。按：“鸡冠猴佩”，又作“冠鸡猴猴”，指头戴饰有雄鸡的帽子，身佩饰有公猪的饰物，形容古代好勇者的服饰。这里显系作者借用该成语来讽刺传统史学中不入流之作。

⑤宋慈抱《与刘京卿翰怡先生书》，宋慈抱《墨庵骈文甲集》，1921年刻本，第15页。

⑥宋慈抱《甲申年五句述怀四十四首》，无页码。

⑦宋慈抱《鸚鵡洲吊祢衡》，宋慈抱《寥天庐诗续钞》（上），1937年铅印本，第12页。

⑧宋慈抱《以〈皇清经解〉〈资治通鉴〉置行装自随口占》，宋慈抱《寥天庐诗钞》卷3，1929年刻本，第11—12页。

⑨傅振伦《刘知幾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1页。

⑩宋慈抱《秋兴》，宋慈抱《寥天庐诗续钞》（上），1937年铅印本，第16—17页。

⑪参见：瞿林东《编次、主题与逻辑——关于〈史通〉的几种读法》，《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56页。

的编修情况,《注释》、《补述》两篇梳理了注、改、补历代正史的私修史书;《沿革》篇将史书类别由刘知幾所提出的6家扩充为16门,对每一门均简要定义,评论其作用与优劣。关于史书表现形式,《续史通》效仿《史通》,以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为对象,对本纪、列传、载记、论赞、表、志进行论述,发展和修正了《史通》的主张。如宋慈抱赞成刘知幾关于体例重要性的认识,但主张史例应跟随时代的变动而变化,“史固不可无例,然例亦随时而变”^①。在史表的立废上,与刘知幾竭力否定史表不同,宋慈抱推崇史表,肯定史表对本纪、列传的辅助意义,“法至美也”^②。

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史通》在直书其事、模拟古人、史文繁简等方面均提出了精彩见解。刘知幾认为模拟古人,贵在“貌异而心同”,即重在精神层面的相似,侧重于“道术相会,义理玄同”,同时注意外部时势的变化,做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③。对此,宋氏深有体会,他发挥刘知幾的“貌异心同”说,主张拟古需考虑时势变化。他认为拟古仅“随好恶之私”,将会产生“失其旨”、“不于伦”的谬误,例如《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模拟《史记》对人物进行分类立传,却选择门阀作为划分依据^④,终是貌合神离。宋慈抱对马骥《绎史》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不同态度,更能说明他对“貌异心同”的坚持。宋氏虽肯定《绎史》具有“稽古之功”,但仍因其不明时代差异而被他批评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⑤。《明儒学案》则相反,宋慈抱认为该书深得随时变通之义,“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以考今为稽古之助”^⑥,经世之意确凿,值得肯定。在史文繁简上,刘知幾认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古今史书撰写风格的差异和叙述史事的多寡导致史文繁简不同,因此要求“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⑦,无须执着于史文繁简划一,仅需考虑应否记载和是否缺失。宋慈抱同样指出史文繁简不可一概而论,“史文之繁简所损益,不可以一言尽也”,应详细考量史书撰写的具体背景与材料丰简的程度,认为史书“赘累不足责也,漏落斯可忧焉”,缺漏远比繁芜更令人担忧,进而要求史家应“撷其精华,去其糟粕,考古勿失于迂,述今勿流于滥”^⑧。他提出的警惕“迂”、“滥”的批评理论,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关于史书编纂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刘知幾主张文约事丰,“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⑨,提出以省句和省字的方式实现撰史简洁之美。宋慈抱吸收了刘氏尚简观点,要求删汰浮词,而且更重视史书文字的生动。如刘知幾批评《公羊传》中部分文字繁冗,并进行示范性点烦;宋慈抱则认为“详叙之则弈弈有神,总言之则淡淡无味”,节省数十字,反而“没其神”^⑩。此外,在史馆集体修史问题上,宋慈抱同样汲取了《史通》的观点。刘知幾在《史通·忤时》篇痛陈史馆修史五大弊病,包括:修史者互相推诿,尸位素餐;史料收集困难;史馆环境不利于直书褒贬;监修者要求不一,而使修史者无所适从;监修者不明史学的刊削、铨配^⑪。《续史通·监修》亦分析了集体修史的诸多弊端:第一,“设局纂修,压以公令,备员监察,不许异词”;第二,文人修史带来的问题,如“载绝无关系之文,删极有是非之事”;第三,修史者为当权者讳,记载史事模棱两可;第四,党派门户之争影响史书记载;第五,缺乏统一裁断,导致众说纷纭;第六,史书的分纂,使史家互相推诿^⑫。将宋慈抱和刘知幾的观点两相对照,即可发现:宋氏提出的第一、三、四条,与刘知幾提出的史馆环境不利于史家撰述的批评紧密相关,是宋慈抱从修史机构设置、史家所处的政治氛围方面对刘氏意见的进一步细化;第五条则与刘知幾责备监修者要求不一而导致修史者无所适从基本一致;第二条对文人修史

① 宋慈抱《续史通·体例》,《瓯风杂志》1935年第13期,第41页。

② 宋慈抱《续史通·表志》,《瓯风杂志》1934年第10期,第30页。

③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卷8《模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206、205页。

④ 宋慈抱《续史通·模拟》,《瓯风杂志》1935年第17、18期合刊,第8—9页。

⑤ 宋慈抱《续史通·因时》,《瓯风杂志》1935年第17、18期合刊,第12页。

⑥ 宋慈抱《续史通·两案》,《瓯风杂志》1934年第9期,第27页。

⑦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卷9《烦省》,第245、246页。

⑧ 宋慈抱《续史通·损益》,《瓯风杂志》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15、17页。

⑨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卷6《叙事》,第156页。

⑩ 宋慈抱《续史通·问刘》,《瓯风杂志》1935年第21、22期合刊,第23页。

⑪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卷20《忤时》,第554—556页。

⑫ 宋慈抱《续史通·监修》,《瓯风杂志》1935年第15、16期合刊,第6页;第17、18期合刊,第6—7页。

的批评,虽不见于《忤时》篇总结的五大弊病,却与《史通·核才》篇指陈的文人修史问题相去不远。针对监修弊端,宋氏还进而提出了“分职任”、“一义例”、“宽岁月”、“简卷帙”之补救四法^①。以上所论,足见《续史通》对《史通》全方位的接续。

综上,无论是宋慈抱撰写《续史通》的缘由,还是他对《史通》的续写、部分观点的发展和修正,都基本上延续了《史通》所构建的传统史学理论框架。金毓黻评价《续史通》“学子玄而能似,亦自可喜”^②,道出了《续史通》与刘知幾之间的学脉联系。

二 张扬江浙史学精神

自章学诚张扬“浙东学术”以来,浙东史学备受瞩目。宋慈抱在《续史通》中自觉称引、继承和发挥包括陈振孙、郭伦、黄宗羲、朱彝尊、杭世骏、章学诚、龚自珍等在内的浙籍前贤之主张。宋慈抱之所以如此,除了桑梓情怀,更多的是为了使民族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续史通·两案》篇中,宋慈抱花费大量篇幅,详列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全部篇名,而不像凌简批评的那样,仅“把两个学案的卷目列出了完事”^③。宋慈抱重视这两部学案,不仅意在梳理学术源流,更是为了凸显史学的经世作用。在他看来,《明儒学案》研究时代较近的人物和史事,经世意味浓厚,“时代近则采访易周,笔削严则纪载可信,不以考古凌人,而以通今治世,其书盖契《春秋》大义”^④,值得提倡。杭世骏有“课士必以四通”^⑤之说,于是宋慈抱专列《四通》篇,对《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进行阐述,认为《资治通鉴》深具经世之用,是“《春秋》后劲”,同时肯定《文献通考》的延续和新创之功,并分别赋予《通典》与《通志》“民史之权舆”与“学史之圭臬”的至高地位^⑥,给传统史学名著涂上了近代“新史学”的色调。

尽管宋慈抱常援引《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历代学人和著作的点评,但他在对浙江萧山人郭伦^⑦及《晋记》的评价上却与四库馆臣颇不相同。具体来说,四库馆臣批评郭氏“好持异论”,所撰《晋记》未补作表志且“体例未善”^⑧;宋慈抱则大力表彰郭伦及其《晋记》^⑨,与四库馆臣持论相左。在《续史通》中,宋慈抱多次论到《晋记》,认为该书褒贬恰当,对史事的选择和叙述合理,“贬孙旗、牵秀之奸邪,删贾充、姚萇之事实,先忠义而后浮华,略清淡而详实迹”^⑩,“盖郭氏于典午一代,可谓详治乱之实迹,去支蔓之浮词矣”^⑪;指出《晋记》从众多改修正史的史书如姚之骅《后汉书补逸》、谢陞《季汉书》、茅国缙《晋史删》、蒋之翘《晋书别本》中脱颖而出,后来者居上。他甚至希望其他正史亦能有像郭伦这样的诤友,“《宋》《齐》《周》《隋》等书,恨无郭伦其人也”^⑫。

与直接称引相比较,创造性转化属于更高层次的继承。《续史通》对黄宗羲、朱彝尊、章学诚、龚自珍等学者的观点均有吸收与发挥。在《续史通》中,宋慈抱汲取了朱彝尊强调的因时而变思想。朱彝尊反复申明史书体例因时制宜的重要性,或是“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或是“史盖因时而变其例”^⑬,这一点被宋慈抱所接受。宋氏要求史书的体例与内在结构均因应时,批评拟古、泥古的做法,并引申出古今平等及重视当代史的认识,提出“生明代而必治明代史事,生清代而必治清代史事”^⑭。宋慈抱以诗为史的观点来自

① 宋慈抱《续史通·监修》,《瓯风杂志》1935年第17、18期合刊,第7—8页。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498页。

③ 凌简《刘咸忻的〈史学述林〉和宋慈抱的〈续史通〉》,《中国史学史资料》1961年第4期,第17页。

④ 宋慈抱《续史通·因时》,《瓯风杂志》1935年第17、18期合刊,第12页。

⑤ 宋慈抱《续史通·四通》,《瓯风杂志》1934年第7期,第22页。

⑥ 宋慈抱《续史通·四通》,《瓯风杂志》1934年第8期,第24页;第7期,第22页。

⑦ 郭伦,字凝初,号幼山,生卒年不详,浙江萧山人,乾隆年间举人,撰有《晋记》68卷。

⑧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晋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页。

⑨ 金毓黻注意到宋慈抱“盛谓郭伦《晋记》”(按:“《晋记》”应为“《晋记》”),而金氏对郭伦《晋记》评价一般。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35、139页。

⑩ 宋慈抱《续史通·补述》,《瓯风杂志》1934年第11期,第35页。

⑪ 宋慈抱《续史通·浮词》,《瓯风杂志》1934年第10期,第30页。

⑫ 宋慈抱《续史通·浮词》,《瓯风杂志》1934年第10期,第30页。

⑬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32《史馆上总裁第一书》,王利民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⑭ 宋慈抱《续史通·因时》,《瓯风杂志》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13页。

黄宗羲、龚自珍。宋氏看重《诗经》，发挥黄宗羲“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①的主张，认为既然《诗经》先于《春秋》，与君王的事迹相关，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②，那么“《诗》与《春秋》相表里，以其为史官所陈也”^③，这就将《诗经》与史官、史学联系起来，进而视《诗经》为“风俗史”^④、“民俗史”^⑤之始，突出了《诗经》承载社会风俗、教化伦常的作用。龚自珍评价张维屏《国朝诗征》时，探讨了选诗与作史的关系，认为它们“皆天下文献之宗之所有事”^⑥。宋慈抱赞同龚自珍的见解，从《诗》关乎“人心世教”的角度出发，认为“选诗之功与作史等”^⑦，肯定诗对保存文献和“采风问俗”^⑧的积极意义。

章学诚的学术主张对宋慈抱的影响较其他浙籍学者突出。梁启超认为，章学诚与刘知幾、郑樵同为最有关系于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的三个人^⑨，而章学诚的学识尤在刘知幾、郑樵之上^⑩。尽管宋慈抱在《续史通·诂章》篇中对章学诚有些批评，但综观《续史通》，其中的许多观点是在《文史通义》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以宋慈抱对经史关系的认识和“史德为根”论，说明他与章学诚的赅续关系。众所周知，“六经皆史”是《文史通义》的核心思想之一。章学诚以“六经皆史”作为《文史通义》开篇的话，紧接着提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⑪。宋慈抱亦以“六经述先王之政典，皆谓之史，可也”^⑫，作为《续史通》的首句。这显然是承袭自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心是为了阐发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⑬。宋慈抱也反对“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⑭的看法，提出“经与史同源，事与道一致”，将“六经皆史”的经史关系论推进到经史同源这一层面，并且认为经史同源的关键在于史书记载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史载政治，功固同于经典”^⑮。史学的经世功能为经史同源说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是宋慈抱在经史关系论上的一个重要见解，而这个观点显然来自于章学诚。

章学诚对史家的心术提出明确要求，主张史家应具备史德，“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⑯，发展了传统的史家修养论。宋慈抱服膺于章学诚的史德论，提出“史德为根”论。宋慈抱所论要点有二。一方面，在于史德能区分文人和史家。“史家去取凭才、学、识，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非识无以断其义。三者虽具，无德以贯，则词采以为才，记诵以为学，击断以为识，乃文人之技，非史家之长”^⑰。也就是说，是否具有史德，决定着运用才、学、识处理事、文、义的主体是史家，还是文人。这番话无论是观点上还是表述上均深深地烙上了实斋史学的印记。另一方面，则在于史德是信史的保障。具备史德的史家，方能祛除偏见，做到知人论世，避免出现“誉古人而失其真”的“佞史”与“毁古人而失其真”的“谤书”^⑱，使史书存“万世公言”和“一代直道”^⑲的目标得以实现。关于史德的衡量标准，章学诚认为史家要“气贵于平”、“情贵于正”^⑳；宋慈抱亦强调“平”、“正”，认为有史德的史家“记当时之史事，是非固宜得其平。评古人之史事，贤奸亦宜折

①黄宗羲《姚江逸诗》序，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75页。

②郑训佐、靳永译注《孟子译注》卷8《离娄章句下》，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③宋慈抱《续史通·创造》，《瓯风杂志》1935年第17、18期合刊，第10页。

④宋慈抱《续史通·创造》，《瓯风杂志》1935年第17、18期合刊，第10页。

⑤宋慈抱《瑞安诗征》序，《瓯风杂志》1935年第23、24期合刊，第3页。

⑥龚自珍《张南山〈国朝诗征〉序》，《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⑦宋慈抱《积学斋丛书》叙，《瓯风杂志》1934年第2期，第3页。

⑧宋慈抱《瑞安诗征》序，《瓯风杂志》1935年第23、24期合刊，第4页。

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5页。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28页。

⑪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易教上》，叶瑛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页。

⑫宋慈抱《续史通·惜马》，《瓯风杂志》1934年第1期，第1页。

⑬吴怀祺主编、王记录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363—364页。

⑭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8页。

⑮宋慈抱《续史通·政治》，《瓯风杂志》1935年第23、24期合刊，第34页。

⑯章学诚《文史通义》卷3《史德》，第258页。

⑰宋慈抱《续史通·度德》，《瓯风杂志》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14页。

⑱宋慈抱《续史通·评断》，《瓯风杂志》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20页。

⑲宋慈抱《续史通·损益》，《瓯风杂志》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16页。

⑳章学诚《文史通义》卷3《史德》，第259页。

以正”^①。宋慈抱的这种“平”与“正”是以《诗经》的“忠厚之旨”与《春秋》的“褒贬之公”^②为典范,即希望史家在撰写史书时能给予书写对象宽厚、公正的评价。同时,宋慈抱不止要求史家具有史德,更将史德主体的涵盖面延展至后世的研究者,反对“不揣其处境之逆顺,动取全书,重定凡例”^③的做法。其时,胡适等人已对章学诚的“史德”论给出具有西学因素的新解,而宋慈抱却从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出发理解实斋史学主张。凡此,均可反映宋慈抱对浙东学术的承继意识和民族本位的自觉。从某种意义上说,《续史通》可谓浙东史学在民国时期的复活。

曾有人评论宋慈抱治学“乡土之见太重”^④,这话颇有贬抑之意,但仅得其一而未得其二。的确,宋慈抱的史学著述有浓厚的地域学术特点。浙籍前贤是宋慈抱咏唱的对象,如《两浙名流八咏》咏叹俞樾、孙衣言、李慈铭、戴望、袁昶、孙诒让、黄以周、王六潭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但《续史通》中所表达的却非乡村迂儒之见,而是对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宣扬和发展,是一种出于对文化断裂的担心而对固有学术血脉的有意延续。民国以来,科学化、欧美化的技术、制度与思想理念,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并对中国传统学术产生猛烈的冲击。宋慈抱对传统学术饱含深情,他撰写《续史通》,为的是延续传统史学理论学脉,为传统学术注入新的生命力。

三 省思主流史学

《续史通》连载于办刊风格略显保守的《瓯风杂志》和《国学论衡》上,加之内容结构和观点上的传统取向,难免被时人视作“遗老遗少们弄的把戏”^⑤。其实,《续史通》也是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饱含传统学术的温情,承载着延续传统史学之使命,另一方面也蕴涵了作者应对现实挑战和未来史学发展的思考。

宋慈抱对民国时期主流史学界的动向是很关注的。五四时期,学术界对“国故”进行清理,特别是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⑥,影响很大。胡适、梁启超相继开列国学阅读书目,引发研究者与读者的广泛讨论。许多学者亦发表了对国学书籍的观点,如周予同在《中学国文学法之商榷》中“依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加以增减,排列次序也稍稍变更”,向学生们推荐了“几部重要的书籍”^⑦。李笠撰写并反复修订《国学用书撰要》,介绍了哲学、史学等方面的书籍。需要指出的是,周予同、李笠皆温州瑞安人,与宋慈抱同被称为“瑞安十才子”^⑧。宋慈抱自然对这股国学热潮有所感知,这从他刘绍宽所拟《国学读法举隅》的评价与补充中也可推知。刘绍宽认为“文史须读刘勰《文心》、钟嵘《诗品》、刘知幾《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及二十四史,宋慈抱则以为二十四史不可遍读,仅需提纲挈领地选取部分阅读即可,“仅于四史以后,阅正、续《资治通鉴》……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诸史志、王夫之《读通鉴论》、“九通”节本、马骥《绎史》和《通鉴纪事本末》^⑨。尽管宋慈抱并未提及胡适、梁启超等学者在国学入门书籍上的主张,但他与刘绍宽关于应读书籍及读法的交流,可以看作主流学界之国故运动在地方上的一个反映,体现了宋氏对学术热点问题的关切。

将宋慈抱定位为具有民族本位思想的史学家,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守旧派人物,也不说明他对传统学术缺乏批判精神。事实上,宋慈抱对传统史学也有不满,这从他对梁启超学术观点的认同中可见一斑。宋氏在《太平刍议》中已展露出对梁启超的关注,他对卢梭及《民约论》的认识和评价基本来自梁氏的《卢梭学案》。梁氏批评中国旧史学为君史,而西方史学为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强半皆君史也”^⑩,呼吁史家撰写民史。《新史学》抨击旧史学具有四蔽、二病,斥二十四史为“二十四

①宋慈抱《续史通·评断》,《瓯风杂志》1935年第19、20期合刊,第20页。

②宋慈抱《续史通·补述》,《瓯风杂志》1934年第12期,第36页。

③宋慈抱《续史通·补述》,《瓯风杂志》1934年第11期,第35页。

④伍叔悦《伍叔悦集》,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402页。

⑤夏鼐《夏鼐日记》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页。

⑥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期,第5页。

⑦周予同《中学国文学法之商榷》,《学生杂志》1923年第10卷第6号,第13—16页。

⑧王超六《人物小志:复旦“二周”——周予同与周谷城》,政协瑞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瑞安文史资料》第8辑,1990年印行,第68页。

⑨宋慈抱《书刘厚庄〈国学读法举隅〉后》,宋慈抱《墨庵二十以后古文》,第25—26页。

⑩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0页。

姓之家谱”^①。宋慈抱赞同梁氏的批评,称“梁任公谓中国三大儒书须读,司马迁《史记》、郑樵《通志》、黄宗羲《明儒学案》也,余亦西人所云家乘、族谱已耳”^②,更直言梁启超对二十四史痼习的批评是洞中窾会,直击要害。由此引发《续史通》格外强调区分家谱与国史,对“视国史为家乘”^③的《南史》、《北史》予以严厉批评。梁氏批评旧史学皆为政治史,褒扬黄宗羲《明儒学案》创立学术史是“史家未曾有之盛业”^④。在《续史通》中,宋慈抱认为传统史学蕴含民史、学术史、政治史,《尚书》是“政治书”,《诗经》为“风俗史之始”^⑤;《通典》“详于民生之利害贫富”,是“民史之权舆”;《通志》“详于学术之源流正变”,是“学史之圭臬”^⑥;其中民史是由先秦时的风俗史或民俗史发展而来。宋慈抱以《诗经》记载了治世与乱世里的国计民生,此后的史书关心民生越来越少,“《史记》而后,《通典》以外,班孟坚、欧阳修留意民治,十有其三四,房元龄、李延寿留意民治,十有一二,沈约、萧子显、脱脱,几无有焉”,更多的史书执着于“帝王传授之虚文纪载”与“臣子篡弑之实迹忌讳”^⑦等政治斗争。他在古代史学的长河中追溯民史源流,发掘出古代史书蕴含关心民生的一面,只是后世史家逐渐遗失了这一传统,这可以视为对梁启超“无史”论的补充与修正。梁氏以学案为学术史的观点,“风靡一时,被认为是对学案的新看法”^⑧。宋慈抱采纳学术史的提法,并将学术史上溯至郑樵《通志》,同样具有扩充意义。梁启超曾有意于编撰通史,拟定了《中国通史》目录,将中国通史分为政治部、文化部、社会及生计部^⑨,再在各部下设具体分类;而《续史通》划分、探索政治史、学术史、民史的举动,竟隐隐与之有相似之处。宋慈抱曾撰有《梁启超传》,述其一生政治经历和学术成就,对他力图造就客观的新史、撰成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等学术理想了然于心,并采张荫麟的高度评价作为结论,认为梁启超“有大造于文教,无毫末负于国家”^⑩,可见宋氏对梁启超的追思与赞誉。

顾颉刚于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⑪说,引发大规模讨论,“古史辨”运动由此肇端,“疑古”思潮席卷中国史学界,猛烈冲击中国古史体系。对于“古史辨”运动,宋慈抱十分不满,批评道:

至国学研究院,为治国学最高门径,然未闻文儒蔚起,如科举中人之段、王以经学名世,曾、左以功业匡时也。其稍稍强人意者,摭拾刘知幾、刘彦和之说,自谓得文史源流,剽窃姚际恒、崔东壁之书,自谓明典籍突奥,而荒经蔑古,非圣无法,十人中盖八九如是矣。^⑫

宋慈抱批评国学研究院中有人“摭拾”、“剽窃”前辈学者,打着明晰文史典籍的旗号,“荒经蔑古,非圣无法”,并由此造成很大消极影响。结合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初期担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助教的经历,及其对刘知幾、姚际恒、崔述等人疑古精神的推崇,可知宋氏笔下的批评对象确系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于疑古,宋慈抱十分谨慎。面对吴缜纠《新唐书》之谬、钱大昕又纠吴缜错谬的事例,宋氏感叹:“疑古下笔,亦岂易事者哉?”^⑬对于疑古与信古间的关系,宋慈抱作《疑信》篇进行专门探讨。他指出,讨论历史需掌握好疑与信的度,“论史而疑古太甚者,必流于恣肆。论史而信古太甚者,必失于固陋”^⑭。宋慈抱关于疑古与信古是否太甚的标准,不得而知,但从其仿《史通·暗惑》作《辨惑》,对部分史书中可能存在不实之处的批评来看,他确实不盲目信从古代史家与史书,只是疑古程度弱于摧枯拉朽般的“古史辨”运动。宋慈抱既非

①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42页。

②宋慈抱《书刘厚庄〈国学读法举隅〉后》,宋慈抱《墨庵二十以后古文》,第25页。

③宋慈抱《续史通·恨李》,《瓯风杂志》1934年第3期,第9页。按:晚清及民国报刊数据库中的扫描件出现了内容顺序错乱,特此说明。

④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6页。

⑤宋慈抱《续史通·创造》,《瓯风杂志》1935年第17、18期合刊,第10页。

⑥宋慈抱《续史通·四通》,《瓯风杂志》1934年第7期,第22页。

⑦宋慈抱《续史通·创造》,《瓯风杂志》1935年第17、18期合刊,第10页。

⑧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页。

⑨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9集,第610—611页。

⑩宋慈抱《梁启超传》,《国史馆馆刊》1948年第1卷第4期,第96页。

⑪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1923年第9期,第3页。

⑫宋慈抱《太平彗议·论学校第五》,中华印刷所1928年石印本,第14页。

⑬宋慈抱《续史通·唐书》,《瓯风杂志》1934年第6期,第18页。

⑭宋慈抱《续史通·疑信》,《瓯风杂志》1935年第23、24期合刊,第36页。按:刊登在《瓯风杂志》上的《疑信》篇并不完整。

疑古派,也非信古一脉,乃是一位具有怀疑精神的史家,但他的怀疑精神有限度,他的信古亦是审慎判断的结果。

综上,宋慈抱是一位具有民族本位思想的史学家,肆力于对传统学术体系与命脉的传承。用保守对他进行定性,是一种简单化评价。因为用保守评价他,既不能概括和解释其思想的全部面相,也不能反映他在新旧之间的取舍。戴逸说:“20 世纪的思想界,包括历史学界在内,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人们既破除传统,叛离传统,超越传统,又回归传统,认同传统,继承传统,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摇摆。”^①历史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的结果。在中与西、古与今的交汇和碰撞期,具有民族本位思想的史学家,他们守护史学传统,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实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放在历史的长时段,毫无疑问,他们亦是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股力量。进入 21 世纪以来,像国粹派、南高学派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史学倾向受到肯定性评价,一反过去对之批评和否定的态度,就是这个道理。

Ethnocentrism in Song Cibao's *Xu Shi Tong*

Jian Lingjiao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Song Cibao wrote *Xu Shi Tong* in the name of “renewal” at a time when the European style was flourishing. By emulating and promoting Shi Tong and its traditional historical theories, Song strives to pass on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system, which reflects a distinctive ethnocentrism. *Xu Shi Tong* also consciously cites and inherits the historical claims of Zhejiang scholars, thus respecting Zhejiang scholars and Zhejiang school in historiography. Song Cibao's guardianship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seemed anachronistic at that time, but is in the long run an indispensable academic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Song Cibao; *Xu Shi Tong*; ethnocentrism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